

中国人民大学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性社会学研究所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Sexuality and Gender

<http://www.sexstudy.org>

[首页](#) | [学科建设](#) | [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著作发布](#) | [图书检索](#) | [通俗文章](#) | [文献介绍](#) | [讨论地带](#) | [通讯文档](#)

您的位置: [首页](#) -> 中国性文化研究

当前性革命概述

作者: 潘绥铭 等 来源: 《当前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第一章 类别: 中国性文化研究 日期: 2005.05.17 今日/总浏览: 1/198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2月出版, 41万字。ISBN: 7-80190-131-2 / B.008

潘绥铭 等: 《当前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第一章 (全文版权所有)

当前性革命概述

1976—1985: 性革命的准备

“文革”把性依附于政治, 那么政治一变, 性也必变。

文革结束之后, 1976年到1985年间, 中国性文化出现了一个恢复与过渡时期。当时的主要特征就是从性的外围开始, 首先把那些被文革弄得过份荒谬的事物, 恢复到大体相当于1950年代的状况。

首先, 婚姻的价值又被重新承认甚至被发扬光大了。从1976年开始, 大批知青返城, 急匆匆地踏上婚姻之路。1979年后, 大批文革中被棒子打散的中老鸳鸯们又重圆旧梦。1983年左右, 最高层开会发文件, 动员工青妇一齐上阵做红娘, 解决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 又创一个世所罕见。

其次, 爱情重新“抛头露面”。虽然国产文学仍在念着1950年代那一代人的经, 但舶来品却挟来一股浪漫情爱之风, 逼出《小花》那样的“膜拢爱恋”和《庐山恋》的绝对纯情。不过, 几十年风雨剥蚀的大陆之土难生仙果, 纯情文学很快就只剩一个永远不老的琼瑶了。

第三, 生活环境中又开始有性的色彩了。仅举一例足矣: 笔者1984年搬家时蓦然发现, 我的、妻子的和孩子的所有旧衣服, 已经沒有一件再能穿出去了, 旧照片也全都没法再看了。

第四, 那时人们的心气也不一样。“现代化”一词险些又成为社会共识, 而且国家似乎是老树发新芽, 人人都觉得只要闭眼走下去, 总会有自己一个位置的。因此性这个东西还是放在方圆之内为好, 免得惹事生非, 干扰前程。所以, 尽管1980年代初东南沿海已有“黄潮”登陆和“半夜鸡叫”(“小姐”揽客), 但中国性文化还是奋力地向升平迈腿。

可是, 从1980年起, 两个表面看来与性无关的事物横空出世了。它们给中国人性观念的巨变打开了大门, 也为性革命做好了准备。它们就是1980年公布的新《婚姻法》和1980年开始提倡和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

“婚姻神圣”的瓦解

在1980年的《婚姻法》中，离婚的必要条件被修改为：第一，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第二，经调解无效。这似乎无关大局的一改，其实真够得上石破天惊。它使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奉行自由离婚的领先国家。从此，中国人逐步地确立了一系列新观念：爱情是婚姻的灵魂、爱情至高无上、没有爱情的婚姻才是不道德的……。《婚姻法》把爱情成为婚姻的目标与衡量标准，各种婚变的可能性大增。从此，“五四”以来无数先进分子所苦苦追求的爱情理想，终于开始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开花结果了。

于是，我们麻木惯了的心灵必然出现慌乱与盲动。1980年代初期，哪一家传媒没有不吝篇幅地开设过“道德法庭”来诅咒“当代陈世美”？多少人为“秦香莲上访团”撒下了一掬同情之泪？人们都天真地以为，那些钻《婚姻法》空子的家伙只是支流和一小撮。其实是把所有文革后向上流动的个人的婚姻，都纳入了“道德法庭”的监视范围之内。有谁想到过，仅仅十几年以后，中国处处高歌“不求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

我们一直在批判西方的性关系解放，一直在打“飞进来的几只苍蝇”；可是时至今日，我们应该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一旦高扬起爱情的旗帜，不管什么样的民族，它的婚姻形态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巨变。

独生子女国策——生殖革命，性革命的亲娘

从1980年起，独生子女政策如同无尽的涌浪，如同水银泄地，不但成为国策，而且成为绝大多数城市夫妻的自觉行为。

独生子女国策给中国人的婚姻和性文化带来了几个意想不到的客观结果：

首先，“性的快乐主义”得以“合法化”。

决策者大概从来没有意识到：性只是为了生儿育女观念，是数千年来抑制性快乐主义的最大法宝。但是独生子女国策却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合法地、铺天盖地般地宣称：人们之所以过性生活，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儿育女，甚至不允许仅仅为了生儿育女。

那么为了什么呢？官方从来没有回答过，但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明白：生完一个孩子，干嘛还要过性生活？用着避孕工具来性交，不是寻欢做乐是什么？老实人可能说：这是为了增进夫妻感情。可是难道告痛苦来增进吗？人们的性生活，除了表达爱情和寻求身心快乐，怎么可能还有别的目标？

于是，渐渐地，有没有快乐（而不是有没有子女）开始成为夫妻衡量自己的婚姻质量的重要标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夫妻之间寻求那些更能够使双方快乐的性行为方式；性知识、性科学开始成为人们的急切的需求；几乎一切性方面的传统观念都被质疑了。

说到底，只要一承认性里边还有快乐，从“文革”到“五四”到孔子，所订下的一切性行为准则和大部份性关系道德就都会一溃千里。试想，如果只有跟别人性交才有快乐，禁理何存？

其次，惩罚非婚性行为的主要利刃被“折戟沉沙”。

在独生子女国策之下，避孕与人工流产不仅是合法的，而且简直就是天经地义的。最现实的产物是：偷情更安全了；私生子女几乎不可能出现了。奸情的败露，历来是当场被捉者少，私生子女招灾的多。现在为了计划生育，避孕流产都是好事，谁还会傻到让婚前或婚外性行为生出孩子来？医生们做人流，连结婚介绍信也不要：“要道德？那中国就又多一个人！”结果，社会也就丧失了千百年来发现和制裁非婚性行为的最有利武器。

这个“革命”，在我们中国进行得出奇地迅猛和顺利，几乎没有人反对过。而在美国的1960—70年代，大批虔诚的教徒上街游行，或者在计划生育门诊部外面布置纠察线，阻止人们去避孕和做人流。他们很清楚：避孕套和避孕药丸的普及，必然斩断上帝用来控制人类性行为的手臂。因为，有了合法的避孕和人流，就不再会有私生子，卫道士们就根本无法再发现那些非婚的性行为，还怎么能够“杀鸡给猴看”？

不过，人们大可不必因此而担忧所谓“未婚母亲”或者“少女夫妻”。因为在当今中国，哪怕你是未婚先孕，如果没有“准生证”，那惩罚恐怕也是一般人受不了的，往往只能人流了事。所以，中国青少年的性行为再普遍，也不可能出现那么多“少女母亲”。

第三，女性的性革命成为可能。

由于独生子女国策，女性不仅少怀孕、少生育，而且消除了对于怀孕的恐惧与顾虑，再加上青春期在提前，更年期在推迟，于是，中国这一代女性将有可能把空前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性生活。女性潜在的性欲望和性能力也必将被解放，而且可能会高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难怪在西方反对计划生育的人里，那些“老处女”般的正统教徒格外多。难怪在中国也出现了性方面的“阴盛阳衰”、“专治阳痿早泄”的广告贴遍大街小巷。大约中国男人相形见绌了吧？这，难道不是“女性性革命”的根基吗？

第四，下一代的“性前途”成了问题。

在国策的掩护之下，独生子女的一代如果真的搞起“性革命”来，他们的家长还能象传统中国人那样，搞什么“棍棒之下出孝子”吗？到21世纪的开端，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跨入婚恋期和性活跃期。可是，他们面对着6倍的成年人和成年人所拥戴的社会（两个父母+两个祖父母+两个外祖父母），是更加唯唯诺诺呢，还是更加“造反有理”？如果国策持续，2020年之后世界将出现一大奇观：唯汉语中将不再有叔、姑、舅、姨、兄、妹、侄、甥等字眼儿。那时的青少年会是一批“独秀”，还是一代“孤狼”？

第五，所谓“性变态”将变得有理有功。

按照独生子女的国策的逻辑（一切为了减少人口），所有那些传统上一一直处于少数地位的所谓“性变态者”，都将足以充分地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甚至比天下所有夫妻更有功于社会和国家。这不仅指独身者、自愿不生育者，而且也指同性恋者、变性人，乃至其它种种不损害他人的“怪人”。因此，中国的男同性性关系日益在社会生活中显现出来。虽然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但是在1989年的全国非随机抽样调查中，城市有婚者占到0.5%，农村有婚者占到2.3%；[1]在91年和95年北京市大学生和97年全国男大学生中（包括具有性刺激含义的触摸）占到12%—17%，既有行为又有感情的占到4.2%。[2]在165样本的男（双）同性恋者中，有过肛交的占到48.5%；还有19.4%有过买淫；18.2%有过卖淫。[3]

更重要的是，传统上被认为是“反常”和“伤身”的具体性行为，也将获得足够的合理性，甚至是优越性。接吻、自慰（手淫）、性爱抚、口交、肛交等等性行为方式，过去之所以被歧视，就是因为它们与怀孕无关，违背了“性的唯生殖目标论”。现在，这岂不是最大的优点？

总而言之，独生子女国策实际上是一场“生殖革命”。

回头望去，我们相信，当年制定《婚姻法》和独生子女政策的人们，没有一个曾经想到它们居然会带来这样的结果。这就应了马克思曾经引用的话：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也应了恩格斯的话：斗得你死我活的双方，忽然全都让位于一个新的、从来也没人想到过的新事物。当然，还是中国老百姓看得透彻：歪打正着，骡子下了个小马驹。

危机——性革命的基础

1976—1985，决定未来的深刻危机已然存在。

首当其冲的是：大家全都没有性的信仰与哲学了。

“文革”实在是太彻底了，不但扫光了“西化”，也扫光了“传统”；除了“政治挂帅”，自己又没有创造出任何新东西。“文革”一完，不仅整整一代青年根本无法知道自己应该学习什么样的性观念，而且社会和父母也根本没什么可教的。上层只好说性真的是小事，下层则只好说性真的可以无师自通。尤其是文革中的一代人做父母后，自己性观念就处在矛盾或真空之中，结果各民族最自然而然的家庭性教育，在这个时空里反成了最没人能弄明白的事情。这就逼出了1985年后的社会化的性教育，而绝非几位研究者的匹夫之勇。

可是，此后的社会再也不可能大一统了，而且还有个对外开放。如果人们清醒些，敢于承认我们不仅需要性教育更需要性的哲学，就会明白：苍蝇不叮没缝的蛋，上一次文化革命，实在是这一次性革命之母啊，而且现在才着急，实在是为时晚矣。（而且还在晚下去。批性革命者众，可曾有人讲清楚过：社会主义的性观念与性哲学究竟是什么？且不论有几人会信。）

第二个危机是性方面的年龄阶层的显现。

1970年以后出生的人，到1985年开始进入青春期。他们只知张学友，不知毛泽东。他们以为，性当然要西化，而且是当代西方化，谁叫中国这么落后来着？！

此外，请不要老盯着“代沟”，中国的青年已经开始“反哺”社会了。您看看老年迪斯科、旅游热、时装表演和“黄昏恋”就会明白。1985年之后，实际上不是青年在呼吁性教育，而是青年在用“薄露透”、当众亲昵、浪漫爱情在给全社会上上课；因此才有了中年人的“第二春”；“老来俏”也才变成褒义词。

这可触动了中国历史上最敏感的“接班人情结”。过去只讲血统纯正，所以不怕亡国怕灭种。后来加大政治考虑的力度，“教育下一代”就成了最不容讨论的口号。就连性学研究也是不得不从性教育开头，以便名正言顺。

奇怪的是，正当青年的“反哺社会”方兴未艾的时候，1980年代末，全国各地突然冒出来众多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虽然所有的立法者大概都是想保护他们不受“黄毒”的侵害，但这等于明白地承认：下一代可以具有与目前的成人社会不同的利益，那么，他们的独立的、不同的权利当然也就顺理成章。他们很快就会要它、争取它的。

大概从来没有人给中国的立法者们讲过：西方各国当初也是为了保护青少年，才法定出“性的承诺年龄”，即低于此年龄者无权同意性交，因此一切与他们性交者一律按照强奸罪论处。直到1940年代莱赫的《青少年的性权利》一出，社会才恍然大悟：啊呀，原来这等于承认他们一到此龄就可以同意性交；还等于承认，如果两个同在此龄以下的青少年性交，法律就会尴尬而且束手无策。可是，这时想改变已经晚了，因为青年已从社会的边缘向中心推进，不久便发起性革命，直到令全社会为之一变。

只不过中国的主导价值观仍然幻想着拿性教育当灭火器，而且绝不敢正视一个世界历史的事实——凡是开展性教育的国家，青少年性行为没有一个下降的，只是避孕套的使用率上升了。当然，性教育也没有火上浇油，它只是根本与此无关。因为即使在西方，官办的或者宗教所进行的性教育，也只不过是喋喋不休地念叨着成年人想让下一代干什么，而青年自己想干什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自己决定。

中国离这一天没多远了。在1980年代中期的时候，如果您认真地听了崔健的歌，看了王朔的小说，您对2000年的旋律和色彩就不会那么想不通了。

除了年龄，性别这个阶层也在分化。当讨伐“陈世美”还盛行于大多数报刊之时，女导演就厉声喝问：《谁是第三者》？当清除精神污染之举又快变成破四旧之时，女界却堂皇高呼：“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当报刊大写某女“决定”爱上某英模时，妇女报纸却首开专版来讨论：女性有性权利吗？

就连最根深蒂固的“同一”（工农联盟）也分化了——农村人说：“结婚登记？那是城里人的事。我们从来不兴这一套。”

第三个危机是讲法制。

传统文化都不是靠法制控制性行为，因为只有唯道德论才允许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夜入民宅、“捉奸捉双”。可是一讲法制，那些曾经有效地控制过个人性行为的基层组织和惯用手段就全都玩完了。1984年笔者见过一例：居委会来“捉奸”，门不开，递出一页纸。大妈们以为是结婚证，却是撕下的《法制教育课本》，上批“拿搜查证来。”

解放后，个人一直是单位所有制。但一讲法制，再加上一切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单位也没有那份雄心和闲心去管男女之事了，除非闹出乱子来。可直到现在，政府的口号仍是“齐抓共管”，真不知道谁和谁齐，又怎么个抓法。

第四个危机是人口流动。

不仅是农民流出本村本土，流入城市，而且城里人也流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大杂院和单位家属区，流进老死不相往来的塔楼和商品房，流进“门一关就自由”的单元房，流进越来越多的公共娱乐场所。

我们以往的性道德，全靠“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现在看不到了，眼镜再雪亮也没用。当然，我们还可以杀鸡给猴看，可现在“猴”也看不见“杀鸡”了，怎么办？至少在城市里和外出者当中，中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独处过。性的自律、自导与自享又从何而来？相应的婚姻松散和商业化的性服务要是不出现，那才怪呢。

总而言之，1976年到1985年是一个决定的时期，一切都在那时逝去，又都在那时生长。可是，中国的道德领导者们又在干什么呢？他们不敢认清这些危机，更不敢认清：此乃上次革命之嫡生。他们除了禁和堵的老一套，就是写些只有自己才看第二遍的字儿；而且拒不承认，如果这些字儿管用，就轮不着现在的人来写了。领导者到底也没学会从活人的生活中来理解社会，到底也没想出该对性来点什么建设式意见。结果，从1985年开始，中国的性革命就站出来说话了。

早在1980年代之初，全国各大城市里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性革命”的端倪。它的主要表现是：一些从文革中解脱出来的中上层青年男女，发起了“家庭舞会”、“黑灯舞”、“贴面舞”等活动。他们之间的各种非婚性行为也剧增，甚至出现了一些所谓的“性乱团伙”，进行集群性交，结果成为1984年首次全国“严打”的对象之一。但是，这些青年的活动，毕竟人数很少，社会影响不大，很难作为中国性革命开始的标志。

直到1985年之后，以“精神文明”为口号的社会控制力量、以“性科学”为旗帜的知识阶层的自由主义力量、以“人性论”为理由的民间自发力量，一直处于三足鼎立的局面。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性文化和性的社会实践的变化已

经如此之大，令大多数中国人不得不刮目相看，结果，人们开始感觉到：中国的性革命真的到来了。

性革命的第一方面：性与生殖的更大分离（性哲学的革命）

性哲学革命之一：“唯生殖目的论”破产了。

“性绝不仅仅是为了生儿育女”的观念得到普及，因为在生完一个孩子之后，人们再过性生活的理由就只能是为了维系双方感情，或者干脆就是为了“寻欢作乐”。这样，“性的快乐主义”就第一次在中国有了发展的可能。

性哲学革命之二：避孕和流产的合法化是性道德的杀手。

避孕和人工流产都自然而然地合理合法了，而且受到官方的大力推进。因此，在性生活中的怕怀孕顾虑（尤其对于城市女性）大大减少。

这使得各种非婚性行为的客观顾虑更少，也使得靠私生子女来发现“奸情”的传统社会控制手段基本失效了。

性哲学革命之三：婚姻无常。

独生子女虽然成为“小太阳”（夫妻的轴心与纽带），但是也有助于年轻婚姻的维系。可是独生子女也极大地缩短了夫妻之间的“养育合作时期”，加长了“空巢期”。这使得婚姻更加难于白头偕老。结果，儿女成人后，父母的离婚率大增。

性哲学革命之五：重新审视“性变态”。

由于“性不是为了生殖”，所以一些传统上被认为的“性变态”，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合理性甚至合法性，例如：独身、不生育、同性恋、自慰、各种“反常”体位、口交、肛交。

性哲学革命之六：性的“家教”日益松弛。

由于独生子女国策，使得父母溺爱独生子女的倾向，使得性的道德管束日益松懈；而且祖父母的管束则基本被隔断。结果，传统性道德正在失去最主要的传承途径。

没有兄弟姐妹，独生子女们难于学习异性相处与交往。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持续下降，会造反，还是屈从？2005年就要普遍出生的第二代独生子女，将把中国性文化带向何方？

性哲学革命之七：性教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性教育”，究竟应该是发扬自我，还是知识传授，还是道德管束，逐渐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各种社会势力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关心下一代”的旗号与“人格塑造”理论成为各方面博弈的结果。

潘绥铭 等：《当前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第一章

（全文版权所有）

性革命的第二个方面：性的公开化（性表现的革命）

从1985年开始，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性学”书籍和文章开始在中国公开出版。

阮芳赋的《性知识手册》和吴阶平的《性医学》是当时的破禁区之作。当时还很少有人知道：中国人的房中术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1930年代出了个张竞生，1950年代有个王文彬。于是人们似乎突然意识到：性，可以写了，可以读了，终于在1988年促成了第一次“性学热”。

到1992年10月，据吴宗健的不完全统计，此类书籍（文艺作品除外）已有273种之多。到1996年刘达临统计，已经上升到420种了。（实际上，这股“热”一直坚持到1994年，当某个在北京被传媒炒得炙手可热的大型性知识展览，终于在全国卖不出票，承包人大亏其本的时候，“性的启蒙阶段”也就最终地结束了。）

大众传媒虽然在不倦其烦地挨着个地欢呼“破禁区”，其实这里边的两大历史意义，媒体反而没说。

1. 现代性学蕴含着多种中国过去没有也不会有性哲学。它既打开多样化之门，又堵死回返之路。不用多久，人们的价值判断就不得不主要去参照实证科学的成果，而不是参考空泛和脆弱的人性论。第一批的例证有：对性变态的心理学鉴定、变性手术、计划生育界开始主张性与生育分开并且开展大规模性教育等等。这样一来，尽管房中术重被发现，文化神秘主义抬头，但传统的阴阳性哲学却再也不能“传”，更不能“统”了。

2. 现代性学给中国带来了新的语言工具和可用的词汇，我们才有可能思考、表达和讨论性问题，才能进行性教育。过去，中国话里只有谁都不大懂的文言和谁都不好用的脏话；所以，不仅是皇上和圣人叫我们“不可言传”，我们自己也确实是无言可传。

1985年以后出现了又一场造词运动，以至于性加在石头前面都快能说通了。这本身就是性文化的一大革命，但更重要的是它给社会实践提供了讲台和会客厅。单就“做爱”这一个词的流行来看，就已勾出从“敦伦”跨过“性交”再向前走的历史了。

性学在中国的热闹，并不是因为它的学术水平，而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相信铅字，相信任何正式出版物都代表着官方的微妙态度。所以，中国性学其实只是一个广告，只是使社会中已经出现的变化，似乎变得名正言顺了。这就象“五四运动”只是狂飙，唯有到1930年代以后，才会有人静心坐下来啃学问一样。

但是，性学热的现实效果却不容质疑。从1985年到1989年，凡是思想敏感的人，心里都象揣着个原子弹，恨不能赶快摔向一个什么靶子。于是《性解放宣言》这样的文章居然也得以发表，尽管它根本就说不清要解放什么；又要解放到哪里去。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读过这个宣言，但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性观念转变，无疑是发生在这段时间里。这就象鲁迅预言的：当有人宣布要拆掉整个屋子的时候，墙上才会开辟出窗口来。

人之所想，莫过其言。1980年代初期的“陈世美”和“第三者插足”，开始变成不那么贬义的“婚外恋”，接着又变成完全是褒义的“傍家儿（傍肩儿？）”和“情人”。过去带有粗俗色彩的“上床”和“睡觉”，变成了中性的“夫妻生活”和“性生活”，然后又变成了极富有情感的“亲热”和“做爱”。官方使用的“色情淫秽品”一词，在一些人那里被叫做“毛片儿”，是没有删节过的意思，已经没有贬义；另一些人则称为“劲片”，全然是褒义词了。几乎可以说，1985年以来，当你听到一个人用什么样的词汇来谈论性现象的时候，你一下子就能够知道他（她）的基本性观念是什么，又属于社会上的哪个阶层。

性的公开化之一：性知识可以公开宣讲了。

主流传媒（包括网站）开始宣讲性知识。凡是与医学、婚姻家庭、妇女、青年、计划生育、生活时尚有关的传媒，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性方面的内容，似乎没有人不宣讲性知识了。其结果是：从代际差异来看，这样的传播增加了人们的性知识。

性的公开化之二：色情品的剧增，打破了性的传播禁忌。

这方面的情况几乎尽人皆知，此处只举1990年之初的情况。已经有多少人看过“直接描写男女性交的文字作品”呢？1989年的上海和1991年的北京都在60%左右。多少人看过同类图像材料（照片、录像等等）呢？1989年的上海是29%，1991年的北京是40%。[\[4\]](#)尽管还有一些报刊不时地提起“色情品的危害”这个话题，但是就中国人的实际生活而言，早在那时，这方面的“扫黄”无疑已经失败得快到百分之百了。

性的公开化之三：“性用品商店”在城市中普及。

它们不仅在公开地昭示着“性”，而且使得中国人开始接触到“假性”的难题。这带来了“性与婚姻之关系”方面的哲学困惑：一方面，“因为是假的，才能用”；另一方面，“连假的都能用，别人的真的为什么不能用？”

这两种看法的消长，就是性文化的转型过程。“性用品”的文化意义即在于此。

性革命的第三方面：性行为的革命（真正的性革命）

在1985年之前，由于“房中术”的湮灭，传统的、不成文的、“唯生殖目的论”的性行为规范，实际上是维护礼法社会制度的一种“仪式”。它生产出一种“性禁锢与人口爆炸相辅相成”的社会历史现实。

性革命开始之后，中国人开始寻求性快乐了，因此性行为方式的种类增加了。在1989年刘达临教授进行的非随机抽样调查中，41%的人只用一种性交方式，47%有时变换，8%经常变换。[\[5\]](#)在笔者1989年进行的滚雪球调查的1279样本中，男女曾经肛交的占到7%。[\[6\]](#)

更加广泛地看，中国人现在的性行为革命，是对“平心静气”文化的一种反动与突破，是以“随心所欲”为旗帜，向“个体主义”的一种迈进。

性行为革命的第一方面：性爱抚总量的增加。

在我们的调查中，人们在性交时的接吻、抚摸女乳、抚摸女阴、抚摸男乳、抚摸男阴这些爱抚行为都在增加。

性行为革命的第二方面：性生活方式的种类越来越多。

我们调查了人们采用过的性较体位和刺激方式，发现“女上位”、“后入位”和“口刺激男生殖器”、“口刺激女生殖器”也都增加了。

性行为革命的第三方面：性生活越来越美满。

我们的调查发现：无论是人们对于性生活的满意程度，还是达到性高潮的频率，都出现了显著的增加。

性革命的第四方面：婚姻与性开始分离（性关系的革命）

性关系不仅仅是个体之间的关系，更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法律就是《婚姻法》；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修改的第一个法律也是《婚姻法》；刚到21世纪，再次修改的、直接关系老百姓的第一个法律，还是《婚姻法》。

性关系革命之一：婚前性行为的增加。

婚前性交之事，必须分清是跟谁。如果是只跟同一个人，那么只是“先办真事再办喜事”，在《西厢记》里就有，理应不算“糟粕”，顶多笑曰：“一幅新罗帐，两个旧鸳鸯”。

中国传统性文化所排斥的，实际上主要是结婚之前与别人的“性交合”。这样的人，在北京市总人口中占到4%（李银河，1989，随机抽样）。在北京1980年以后的有婚者中占到9%（潘绥铭，1989，非随机抽样）。在全国占到10%左右（刘达临，1989，非随机抽样）；在1991年和1995年北京大学生和1997年全国大学生中占到10%、8%和10%（潘绥铭，1997，随机抽样）。

已经有人劝笔者：“你别调查多少人有过（婚前性行为）了，该调查调查还剩多少入没有过。”于是笔者就这样去问大学生，还加了个为什么。结果在没有过婚前性行为的人里，60%是考虑到感情因素才没去做，只有20%的人是出于道德考虑。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搞道德教育，最多只能管住五分之一的大学。干嘛不来些爱情教育呢？当然，还有20%的人只是因为没机会去做。不过，这也不能不说是国情吧。

1992年以来，城市青年中浪漫爱情的兴起、婚龄的推迟、试婚与同居的增加、“第五代文化”的出现，都表明作为实体单位的恋爱与同居，已经大大超前于作为社会设置的择偶、婚姻和家庭。

性关系革命之二：多伴侣性行为的代际增加。

在以前的全国非随机抽样中占到6%左右（刘达临，1989）。在北京夫妻抽样调查中占3.7%（李银河，1991）。在滚雪球的1279样本中占到11%（潘绥铭，1991）。在桂林、广州、海口市总人口（应答率29%）随机抽样调查中占到

5%、8%和16%（潘绥铭，1994）。在上海、哈尔滨、甘肃、广东，丈夫占2.3%，妻子占1.5%；此外共有7.9%的人承认有“婚外恋”或者与婚外异性“过从甚密”。（徐安琪，1997）。

有过婚外性行为的人虽然不多，但是舆论对他们的态度已经变了。以前把这叫什么？“搞破鞋”，色香味俱全，只骂不褒。1980年代初期叫成“陈世美”、“第三者”，开始具有中性味道。1980年代中期有叫做“婚外恋”；从1990年代起，北京俗语叫成“傍肩儿”（或“傍家儿”，待考），俨然革命战友之模样。文化人则早就通用“情人”了（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于是就有了一则笑话：以前是“秦香莲”拿着敌敌畏上法庭说：你让他离，我就喝下去！后来是“陈世美”拿着上法庭说：你不让我离，我就喝下去！现在呢？第三者拿着敌敌畏来了，说：你不让他俩离，我就喝！

1990年代的最新动态是：（一幅对联）丈夫喜新不厌旧，妻子吃醋不嫌酸，横批：差不离就行。（双关语：差不多就行和只要不离婚就行。）21世纪的民谣则是：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

过去人们侍奉婚姻统治爱情和性，“先结婚后恋爱”是常事。现在年轻人信奉有爱才结婚，有爱就可以有性。但是也已经有人觉得：三个都不好，不如只有一个好。而上述对联则表达一种倾向：三者分离，反倒相安无事。在可预见的将来，更大的变化恐怕主要源于此。君未闻？处处高歌“蔚洒走一回”。

这方面的变化隐含着更深的意义：在性、爱情和婚姻这三者的相互关系中，性的地位在上升，作用在加大。笔者1989年对北京市居民的非随机抽样调查显示：在对婚姻质量发挥作用的65种因素中，性生活是否和谐，是第三位重要的。而对于“婚变”的可能性，这是第二位重要的。

当然，那时的中国人基本上还是想的多，做的少。好几位研究者的不同调查都表明：虽然宽容婚前性行为 and 婚外性行为的人在大城市里已经非常多，甚至超过了半数，但是自己真正这样做过的人却要少得多，甚至只有百分之几。

性关系“革命”的副产物：性交易和性产业的再度繁荣。

就性问题而言，1980年代的中国人关注的是婚前、婚外的性行为与性关系。这，当然不可避免地把爱情问题也牵扯进来。但是自从1992年起，一种跟爱情，跟婚姻都没有多大关系的现象，开始成为人们谈论性问题时的热点。那就是嫖娼卖淫，以及作为其延伸内容的“傍大款”、“养小蜜”、“包二奶”和纳妾。

在所有发达国家的历史上，嫖娼卖淫都随着性革命而日益衰微（其鼎盛期是19世纪下半叶，而性革命实际上大大压缩了娼妓的市场），而我们在为性解放而争吵了10年以后，却眼看着这种从原始社会末期就开始出现，但一直是发展中的行业，在中国昌盛起来。一年又一年，警方抓获的涉足者越来越多。这究竟是战果，还是癌扩散？结果，我们在1990年代里，不得不来讨论（尽管在传媒中看不到）：该怎么办？

对于1980年代的性观念启蒙来说，这真是莫大的悲哀与讽刺，也是又一次收获了跳瘙。但是对于大声疾呼反对性革命的人们来说，又何尝不是悲哀和跳瘙呢？难道我们中国人一批西方就要复古，一反对性解放就要嫖娼吗？

原因说来也简单：促成嫖娼与卖淫的最主要思想因素，并不是性解放或者反解放，甚至根本就与性观念无关，仅仅是一个如何赚钱或者如何消费的问题。所以，1980年代在性观念方面的大争论，怎么可能对嫖娼卖淫发挥任何一种作用呢？

1990年代的中国已经存在一个性产业。色情品产销是它的广告部门，色情服务是它的外围组织，嫖娼卖淫是它的拳头产品，产销性药具则是它的售后服务。至少在南方某些地方，性产业纵向有7个档次，横向有3大盟友；内部分工协作，组织严密；外部靠山众多，基础雄厚。不敢说黑社会已经控制了多少，但它本身已经形成一股势力，一个利益集团。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红灯区”、“妈咪制”、“二奶”、阶层与分工的系统化。准色情服务业发展。

那么，在1990年代中期的时候，已经有多少男人有过嫖娼卖淫行为呢？在笔者1994年在南方三城市进行的总人口调查中是2.3%，还有大约1%的人曾经试过，另有1.5%的人这样打算过。[\[7\]](#)

要说中国政府“扫黄”不努力，确实有些冤枉。在立法上，不但暗娼的老板可以枪毙，而且一对一的嫖娼卖淫也可以处以最多三年的收容教育。在执法上，每年都有集中打击，每年抓获的人数到1998年已超过40万。就连性产业其实最不发达的北京，也在1999年春天来临之际枪毙了一个“妈咪”。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比西欧19世纪的禁娼运动也并不差。可为什么“越扫越黄、越禁越猖”呢？这恐怕不是“脱了裤子嫖娼，提起裤子扫黄”和“抓了放，放了抓；不放不抓没钱花”所能完全解释的。

主要是由于在指导思想上仍然沿袭着“性是政治问题”的思路（现在叫做“给社会主义抹黑”）。结果越是上纲上线，一旦无法禁绝，政府的威信就越受打击，政治化的口号就越没人听。同时，政治化的方针既忽视了动员和组织民间力量，也不可能充分认识和利用性产业固有的自我抑制因素。结果“扫黄”等于是在替“后起之秀”扫清竞争对手，开拓市场。

笔者客观地总结近1980年以来的发展，发现以三年为一个周期，凡是政府原来拼命禁打的，后来都公开地和普及化了。想想牛仔裤、迪斯科、摇滚乐、三点式、裸体艺术、异性按摩、“三陪”等等，哪个不是如此？黄色录像和嫖娼卖

淫更为明显，1982年广东开始禁，1985年各大城市开始禁，1988年全国首次统一“扫黄”，1991年各省全部建造专用的收容教育所，1994年则是连乡和村一级也开始抓“扫黄”。到1998年呢？许多地方开始对三陪小姐征收所得税。1997年再次全国大“扫黄”，1999年全国严禁“三陪”。可是到21世纪第一年时，性产业是多了还是少了呢？中国人大概都看得见。我们的调查则可以提供详细的数据。

也许，我们不得不一直“扫黄”扫到性产业自动饱和的那一天。

政府绝不情愿如此节节败退。缺了什么？一种性哲学，一种能说服和吸引大多数民众的性的基本理论。“扫黄”理论的五大基点也恰恰是它的五大弱点，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第一个弱点——所谓“黄毒”危害社会秩序和道德。结果老百姓就要想了：夫妻看录像和自愿性交易，根本没有第三者，与社会何干？

第二个弱点——所谓“黄毒”必然引发性犯罪。且不谈这是统计学上的初级错误（分母弄错了），许多人还会问：我就看过，我怎么没去犯罪？

第三个弱点——沾边就扫，不加区别，而且老想扩大化。人们又会想的：连白酒都有度数之分，我喝点“啤酒”或“饮料”，何害之有？

第四个弱点——只讲禁什么，都拿不出同类的替代物。可是现在还有几个人相信人真能禁欲？

第五个也是最根本的弱点——既反不动人性论，又避开商品经济论和“先富论”；既不能接受个人权利思想，又不想知道女权主义在说什么；结果，俗人们当然会说：钱有什么用？吃喝嫖赌抽。因此，繁荣“娼”盛乃“历史必然”也。

正是由于“扫黄”理论收拢不了民心，基层的、自发的、有效的“扫黄”积极分子才寥若晨星。笔者1993年调查南方三城市居民时间：如果您发现不是夫妻的男女在过性生活，又不认识他们，您会怎么办？结果只有极少数的人说自己会报告有关部门，而且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8\]](#)他们有多大可能真的发现情况呢？这跟1950年代和文革中动不动就“人人喊打”，恰成鲜明对照。警察再多再卖力，量刑再重处理再快，也只能涉及嫖娼卖淫者中的倒霉蛋或者无权无势者，能有多大威慑？

民心变了，但不是民想变的，而是“智者”们落后于生活，留下思想真空。他们树立起一个假想敌——西方性解放，又绝不愿意去了解一下，为什么恰恰是在性解放之后，西方娼妓业才急剧衰落？为什么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禁娼，却都不必费我们这么大的劲？

中国“性产业”的理论意义是：

首先，性产业的发展，是对于以往的“纯洁时代”的矫正和对传统社会的回归。

其次，它也把“性”的一个枝节，扩大为一个高度情感化的和非常严重的政治、道德、经济问题。

第三，它掩盖或者扭曲了“性(sexuality)与“社会性别”(gender)之间的本质联系，压抑了中国“男女平权主义”(feminism)的发展。

第四，在中国，性产业还是一个社会应该如何组织的问题；是社会中的各个利益集团之间日益冲突的问题。说白了，性产业这块“唐僧肉”，该谁吃？怎么吃？

性革命的第五方面：“我要性高潮”（女性的性革命）

女性的性革命之一：女性不再仅仅是生儿育女的工具。

青春期在提前（最近20年来，初潮的平均年龄提前2岁）；经历过“文革”的摧残之后，女性首次自慰的年龄下降了；女性的“孕、产、育周期”减少到一次；因此她们客观上有可能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性生活。这是1990年代以来部分都市女性中出现“性革命”的原因之一。

女性的性革命之二：女性不再是“无性人”了，更不是单方面为男所用的性对象了。时至1990年代，在城市人口中，性方面的阴盛阳衰已经有所表现了。

这主要反映在夫妻性生活中：由于妻子不够满意，才认定自己在性方面“出毛病”而且四出求医问药者的丈夫越来越多。妻子由于婚内性问题而主动发生外遇的也日渐增多。

笔者在1994年对南方三城市的调查数据反映出：在婚内性生活里，女性的期望、企求和评定标准之高，已经开始超过男性了，因此女性的失落、不满和变更意愿也开始超过男性。而在1989年和那之前的各次调查中，几乎在所有方面，男性的期望都高于女性。

如果说仅仅一个调查不可靠，那么笔者在1991年和1995年分别进行的调查表明：在北京市的大学生里，现在的女生发生过各种性活动的人，比91年的女生有了显著的增加。但是在男生里，这个比例却是持平的！

各种性教育的状况，也可以定性地说明一些问题。在北京，在我国各地的县一级城市和单位，甚至在许多基层的企业，来听性知识课程的，总是女人比男人多，也比男人更喜欢提问和发表自己的看法。即使在大众传媒机构里，愿意前来听性学课程的，也一样是女多男少。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大多数男人都以为，自己就是性学专家，尤其是那些看过些许“黄”的男人，更是不把什么性学看在眼里。再者，大多数男人以为，所谓性知识不过就是一些性技巧，再没有别的。可惜，恰恰是因此，男人才很少懂得性的心灵方面的知识，很少能够正视自己，很少知道就要来临的“性别革命”。因此，在性方面，男人在1990年代里开始落后于女性的进展。

最明显的阴盛阳衰，就是遍布全国的、涉及几乎一切可吃之物的“壮阳药”大泛滥。这当然并不能说明真有性功能障碍的男人多起来了，但是确实能够表明，中国男性的性心理日益脆弱，越来越不懂变化了的女性，越来越掉过屁股去寻求老祖宗的帮助。对于“走向世界”来说，这可是最严重的“衰”。（附带一说，这也是中国性学的下一个障碍或者是拖累，因为现在的许多传媒级的性学家，还全然不知当代女性主义在性方面的理论。）

笔者相信，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中国也将进入“性，男人才是弱者”的时代。那时，我们的中国男性们，会不会又一次感到历史在开玩笑呢？

女性的性革命之三：女性的“性自主”正在增长。

我们的调查发现：女性发生首次性行为的年龄提前了；长期伴侣之间的性别地位差异正在缩小；女性在与长期伴侣的性生活中，感觉的良好程度也在增加；而且文化程度越高，女性的感觉越好。

不过，女性被迫性交的情况，是越年轻越多。但是这恰恰说明：年轻女性的“社会性别”觉悟正在提高。她们已经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逆来顺受了。

女性的性革命之四：女性在性表现方面的革命。

这，最典型地反映在女性的装束上。曾经有一位女青年对笔者说：“超短裙、三点式嘛，不是我们（女人）敢不敢穿的问题，而是你们（男人）敢不敢看的问题！”

遗留问题之一：女性的爱情观将会怎样变化？

早在1987年，笔者的一位女研究生就问道：您讲课，为什么老用“非婚性行为”这样的词，那么，有没有“非爱性行为”呢？哪个更该批？

至于最最传统的贞操观，只需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当问到一些“小姐”以后怎么嫁人时，她们往往脱口而出：“他不要我，我还不要他呢！”

当然，女性也不是铁板一块，更不是说变全变。除了惯见的“传统观念”外，也有一些把爱情“唯”得太过的人。有位女青年曾说：她会爱上土匪头子那类人物（所谓“男的不坏，女的不爱”，但大约是在骂男人）。笔者很惊讶：“土匪头杀人放火不说，他可是要嫖娼纳妾的呀，您能容忍？”女青年很坦然：“有爱，他会改的。”

遗留问题之二：向谁开战？

性活动中的性别平等是我们追求的长远目标，但是今天中国的年轻女性不得面对这样的事实：在市场经济的新时期里，男性所拥有的性释放的机会，就象以往一样，仍然比女性要多得多。

结果，在这样一个由男性主导的性的买方市场中，女性不得不在她们的内部相互厮杀。在西方可能发生的“两性战

争”，在中国却似乎正在异化为“好女人与坏女人之战”，而且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可惜，这种战争注定是同归于尽。君不见，中国女性正在日益重视“漂亮”。等到真的“贫学富，富学娼”的那一天，就会“好作坏时坏亦好”了。

遗留问题之三：拿什么做武器？

我们无疑要学习女权主义（或者婉称为女性主义）。但是只有“女”却没有“性”，那早晚也会撑不下去的。剑，确实是男人权力的象征，确实可以用来威慑女人；但是如果女人自己也拿起它，那么不一定是战争，却很可能获得和平。

潘绥铭 等：《当前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第一章 （全文版权所有）

[1] 参见刘达临：《中国当代性文化——中国2万例‘性文明’调查报告》，三联书店1995年5月出版。

[2] 参见潘绥铭：《当代大学生的性观念与性行为》，三联书店，2000年出版。

[3] Pan Suiming: Homosexual Behavioes in Contemporart China, JOURNAL OF PSYCHOLOGY & HUMAN SEXUALITY (USA), Vol. 7(4) 1995, pp. 1-17.

[4] Pan Suiming: Chian: Acceptability and Effect of Three Kinds of Sexual Publictions, ACHIEVES OF SEXUAL BEHAVIOR (USA), Vol. 22, No 1, 1993, pp. 59-71.

[5] 参见刘达临：《中国当代性文化——中国2万例‘性文明’调查报告》，三联书店1995年5月出版。

[6] Pan Suiming: Chinese Wives: Factors Underlying Their Orgasm Frequencies, Conference of Gender Issues In Chinese Societies, Miami Beach, USA, August 20-26, 1993.

[7] Pan Suiming: Changing Sexual Behavior/Relationships in Chinese Cities and AIDS Risk. HIV/AIDS IN ASIA, AIDS program, UNDP, Vol. 4, No. 8, pp.1-3, September, 1995.

[8] 同前注。

关闭窗口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